

近年，中美關係可謂陷入建交四十年以來的低谷。隨着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兩國互相關閉大使館、美國疫情未見減退，以至總統特朗普(Donald J. Trump)本人確診新冠肺炎、美國總統選舉如箭在弦……在一連串複雜而微妙的事件影響下，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值得各界高度注視。敝刊誠邀關心中美局勢與世界政經格局的海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深入評論和剖析美國大選後中美關係的前景，以饗讀者。

——編者

概念史研究是史學得以深化的路徑

概念史研究旨在考察概念在不同語境中的具體語義及其異同，以便獲得概念的「在場」意義。尹淑鉉的〈人權與民主的變奏——五四運動前後民權概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2020年8月號）一文，以二次革命失敗到五四運動前後這一階段的「民權」概念演變為其研究重點，梳理了民權概念在不同的社會政治語境中的具體語義，同時也揭示了民權概念演變背後駁雜的政治思想及其嬗變。

首先，注重辨析跨語際的概念。民權概念譯自日本，在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下，其語義既包括天賦人權，又包括國民權。隨着西方著作的大量移譯，加之學界有意對此概念進行區分，民權則又僅指國民權。就上述而言，反映的是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民權語義的縮小及其「所指」的轉變。

其次，注意個體思想的轉變。在高一涵、陳獨秀等知識份子的筆下，概念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對天賦人權的評價因勢而變，民權概念逐漸與「民主」結合，皆是顯例。當然，究其原因，既有他們自身對法國大革命和啟蒙思想家學說的反思，也有當時社會運動的影響。如果不關注這些個體思想的轉變，核心概念的歷史語義就無法得到充分詮釋。

最後，重視社會語境的變遷。在俄國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作用下，社會主義思想逐漸在中國傳播，「民權」的具體語義逐漸發生變化。在五四運動之後，民權概念已不限於政治問題，還包括社會經濟的平等問題。當然，這些變化也離不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影響。

尹文對民權概念的演變進行梳理，以小見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窺探當時中國的政治走向。略顯不足的是，尹文僅以報刊雜誌為主要的文本憑藉，卻忽視了辭典類工具書的使用，例如《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對「民權」的釋義也頗具典型。總之，尹文以民權概念史為研究主線，輔

之以人權和民主的變奏，在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問題，諸如，民權概念的演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民權能否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因素？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陳權 天津

2020.8.17

構建中國本土家庭理論的有益嘗試

計迎春的〈「馬賽克家庭主義」——從女兒養老看中國家庭制度變遷〉（《二十一世紀》2020年8月號）一文，通過對長三角地區中城鄉高度融合的H城中二十一名女性養老實踐的深入調查，發現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發生一場家庭代際關係和家庭制度的變遷，包括父母和成年子女依賴共生模式的形成；金錢、情感和實踐等多種元素的交織；父系家庭規範弱化，母系家庭實踐強化，出現了「雙系多核」模式；在現代性別規範愈益鞏固的同時，傳統父權規範亦得以微妙重寫甚至強化。在此基礎上，計文進一步詮釋了「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在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

家庭模式產生的過程中，傳統和現代規範，金錢、情感和實踐雜糅並存。

計文採用定性研究的半結構性訪談和參與式觀察的方式，選取的二十一名女性樣本涵蓋了不同世代，並兼顧教育程度差異，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研究的可靠性和普適性。計文基於她們的養老實踐，着重探討了當代家庭關係中的權力消長及其背後的成因，繼而對馬賽克家庭模式的前景加以估量：「女性的家庭—工作矛盾日益尖銳，她們可能會面臨照顧子女、公婆和父母的三重負擔。……有可能進一步導致生育率和女性勞動市場參與率雙雙走低，小則影響到個體家庭的財政境況，大則影響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此類反思頗具警示意義。

儘管作者的研究視野和走訪記錄令筆者讚歎不已，但仍不免就其可能忽視或討論不夠充分的一些瑣屑略陳一二。該研究固然對樣本有深入調研，然而二十一人數量，未必具有很強的代表性。樣本全為女性雖可彰顯女性表達，也必然造成了「男性的失語」，家庭制度變革的實相或許還應兼採多方論述才足以徵信。儘管H城城鄉高度融合，但畢竟是城市，廣大的農村地區情況如何，並未在計文中有所表現。實際上，在當今農村地區同樣存在女性家庭地位上升的態勢，但其內在機理卻與馬賽克家庭模式略異其趣。

已有研究表明，在西部地區的農村存在一個「青年返鄉婦女」群體，這一群體憑藉婚配性別資源失衡、階層分化背景下的階層競爭加劇，而在家庭權力博弈中崛起，這是與市

場化、鄉村男多女少等現實經濟因素掛鉤的鄉村家庭制度的重大變革。此外，由於筆者係歷史學出身，竊以為女性地位崛起的話題，應多少注意建國初期女性解放的相關史實，而非僅將視野置於改革開放之後。

要而言之，計文以「馬賽克家庭主義」為中心的理論框架，是對轉型期中國家庭關係再制度化的深刻審視，對之後的中國社會學及家庭理論的研究者而言，其前瞻性與啟發性是不言而喻的。

鄭澤民 上海
2020.8.28

冷戰與當代中蒙邊疆的「顏色」

劉曉原教授經年致力於探究傳統東亞國家體系向近現代民族國家體系轉變過程中的中國邊疆問題，研究成就卓著。其〈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下）——從兄弟到鄰居〉（《二十一世紀》2020年8月號）一文，對1950年代中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中蒙劃界進入實際操作的這一關鍵時期進行了系統深入的梳理，不僅發掘出諸多為前人所忽略或誤讀的重要歷史細節，更在研究視角和具體分析方面發前人所未見，必將產生深遠的學術迴響。

劉文詳細論述了在1950年代，中國向蒙古和邊民解釋為何社會主義兄弟國家要有明確邊界劃分時，特別強調防範西方從邊界地區進行滲透和顛覆。筆者認為，從更長程和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之所以提出中蒙應釐清邊界並進行管理，固然可能與當時朝鮮戰爭

激化有關——美國有意在中國控制力較弱的邊疆區域進行各種間諜滲透活動，而通過劃定邊界、加強邊界管理以防止敵對力量滲透顛覆的這一舉措，後來也出現在中國處理中印邊界、中緬邊界問題的過程中。

劉文更指出，1960年代初開始，中國之所以在邊界管理上對周邊國家不再進行意識形態區分，而一律視為「對方人員」，是因為中蘇、中蒙關係破裂後，中國在進行邊界管理時對其「顏色」的認知進一步發生變化，防範對象不再是帝國主義勢力的入侵而是修正主義者的滲透。如果考慮到同一時期中國在有關香港、澳門的邊界管理問題上一直有強烈的防範滲透、保衛政權的訴求，那麼劃清邊界、管控邊疆與保衛政權三者之間的密切聯繫，應當是中國實現領土屬性轉型過程中長久和普遍存在的特點，甚至今天亦然。我們甚至可以猜想，通過劃定、管理邊界來保衛政權，是否冷戰時期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在面對的領土屬性轉型中的「顏色」問題？

此外，劉文還引發學界關注和探討一些重要歷史問題，例如，1956和1957年，中國向蘇聯表示將來要收復蒙古的意向，但為何在1957年末又同意雙邊劃界，並急切地進行實際操作？蘇聯為何也同時展開與蒙古的劃界談判？文章在中國邊疆研究領域的啟示和引發的種種思考，賦予其經久彌重的學術價值。

姚昱 上海
2020.8.18